

11月3日,西南博物馆联盟2025年年会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联盟的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主题研讨会在云南省大理州召开。本次会议由云南省文物局指导,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四川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西藏博物馆、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大理州博物馆承办,大理市博物馆、巍山南诏博物馆、弥渡县博物馆协办。来自西南六省(区、市)的85位博物馆负责人及文博单位专家共襄盛举。

西南博物馆联盟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成效

西南博物馆联盟成立于2010年,从“携手同行”到“抱团发展”,从“区域联动”到“全国范式”,风雨同舟走过15载,现有成员单位185家,约占西南地区博物馆总数的17%,已经成为推动西南文博事业繁荣的中坚力量。

一是联合共建形成常态化机制。2010年发布《中国西南博物馆联盟宣言》,建立《西南博物馆联盟规程》《西南博物馆联盟入盟细则》《西南博物馆联盟业务培训管理办法》等,不断完善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等常态化合作机制,并通过资源共享、互补达成了多项合作。仅过去一年,联盟成员单位联合策划了“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纳西族东巴文化展”等精品展览,举办了西南地区中小博物馆藏品管理培训、“巴山蜀水”川渝博物馆文创展、长江流域文明研学等活动,建立了川渝革命纪念馆联盟等协作平台,深化“伟人将帅故里行·川渝联线”文化品牌建设,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从活动到品牌的有效串联。

二是联盟成员单位由融合走向赋能。西南博物馆联盟覆盖地域广阔,成员单位发展差异较大,“大馆”带“小馆”协同发展成为重中之重。过去一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南川博物馆、永川博物馆等签订总分馆合作协议,四川博物院实施全省20家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展陈提升工程,并设立资阳、峨眉山分院,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建立帮扶关系等。联盟成员单位间从单一项目合作走向深度协作、全面融合,在“总分馆”“帮扶馆”机制下逐步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

三是成员单位综合实力显著提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白九江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西南博物馆联盟交出了亮眼的“西南答卷”。四川大学博物馆、柳州市博物馆等6家博物馆的展览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精品奖、优胜奖;四川博物院、西藏博物馆等11个展览入围2025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或推介项目;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玉溪市博物馆等13家博物馆入选2024年全国文博社教案例宣传展示活动百项创新案例;广西民族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等9个项目入围第二届文化研学十佳案例、十佳线路终选;昆明市博物馆、雅安市博物馆等9家博物馆入选2025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获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成效评估“一级”;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荣获“塞巴斯蒂诺·图萨”国际水下考古奖;三星堆博物馆等3家单位入选第十一届全国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宣传展示活动十佳案例;贵港市博物馆、铜梁区博物馆等6个项目入选2024全国文物修复案例宣传展示活动十佳项目、优秀项目。

西南博物馆联盟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多元探索

本次会议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博物馆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西南博物馆实践”“推进中小型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三大主题,收到学术论文与实践案例11篇,23位嘉宾和专家学者交流发言,启发了联盟成员单位的创新思路。

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分享云南省博物馆的实践经验,提出博物馆展览策划要有系统思维与创新意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公众教育部主任邱晓玲认为,大教育要有大格局、大品牌、大协同、大宣传“四大”理念,在国家战略引领下重构博物馆使命才能更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文化动能;四川博物院文旅融合产业

联心联动联享联赢

衡元庆 胡力芳 雷宇刚

西南博物馆联盟年会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联盟的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综述

发展部副主任万玲认为,推动区域博物馆高质量发展需要政策引领与实践赋能,要以“分院制”创新构建协同发展新生态。

聚焦博物馆核心功能发挥: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甫表示,在博物馆展览叙事中宣传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是推动历史文化陈列叙事转型的关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开发运营部主任黄璐提出,文创产品研发应坚持守正创新策略,构建以文物为根、以人文为魂、以科技为翼、以公众为伴的良性文化生态;西藏博物馆副馆长拉巴次仁提出,要立足地域根脉、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打造特色展览,深化学术支撑,创新阐释表达以提升展览品质。

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省民族博物馆馆长刘国玉认为,要坚定不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公共文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大理州博物馆馆长杨伟林提出,民族博物馆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宣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馆长胡祖艳认为,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路径是活态展示的形式突破、面向青少年的精准教育。

聚焦中小博物馆特色发展: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黄振伟认为,要推动红色教育活动品牌化、培训系统化、传播矩阵化、文化阵地化,要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国际传播叙事创新和引入市场化力量;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提出要“人防+技防”“线上+线下”多维发力,疏堵结合,才能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王璐琪认为,遗址保护利用中遗产档案建设要从“传统实体保管”向“现代数据赋能”变革;楚雄州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苏晖认为,要利用现代化数字技术进行文物信息高效收集与依法开发,促使博物馆文物静态陈列方式转变;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李晓帆提出,科技赋能文物保护与利用才能让历史“活”起来;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苟茂鑫提出,推动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要践行地域性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和阵地性所赋予的教育使命。

新时代西南博物馆联盟发展的未来展望

本次会议,西南博物馆联盟首次提出“联心、联动、联享、联赢”四联理念。这不仅是对联盟实践理念的迭代升级,更是对联盟未来方向的明确指引。中国博物馆协会发来贺信表示,会议主题聚焦区域协同发展,彰显西南博物馆联盟在服务国家大局中的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必将为西南地区文化繁荣注入强大动力。

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宋安来顺在《用好规划型管理工具 助力博物馆特色化发展》主旨报告中提出,规划在推动博物馆特色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有助于避免博物馆偏离方向而盲目运作,并能有效整合目标、资源和方法。成功的博物馆管理最显著的标志在于,能够全面且高效地利用博物馆的可利用资源。博物馆应充分利用MGR规划模式(方法一目标一资源),基于自身能力选择合适的领域作为战略基础,推动特色化发展。

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党委书记朱军以《守正创新 深度融合 全面推进新时代革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分享了红岩实践在革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经验,并提出西南地区革命文物事业应服务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和众多联动发展平台,夯实发展基础。革命文化建设应以“助力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长远目标,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持续推动革命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受邀参会的10位文博专家从第三方视角出发,围绕如何推进中小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文创研发合作、人工智能赋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为西南博物馆联盟的未来发展向汇聚智慧,建言献策。

展望未来,西南博物馆联盟提出深入打造区域博物馆发展共同体,在拓展交流方式、聚焦会议议题、融合多方合作等方面持续探索,为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文化新格局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从四个维度入手推动博物馆无障碍建设

苏辰阳 王京传

实现随时随地“参观”博物馆。

无障碍概念由公共医疗卫生领域引入博物馆学等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之中,逐步成为当代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方向。2022年8月,布拉格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通过的博物馆定义中,明确提出博物馆应实现可及性和包容性(accessible and inclusive)。2024年8月第十届“博博会”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和中国博物馆协会共同主办了“无障碍博物馆学术研讨会”,推动中国博物馆成为包容性、可及性和无障碍的典范。2025年10月在第二届中国博物馆学大会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和中国博物馆协会共同出版的《中国博物馆无障碍建设指南》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在推动无障碍博物馆建设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2025年11月11日至17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召开第27届大会,将可及性(accessible)正式写入ICOM官方出版的《博物馆定义手册》(The Museum Definition Handbook),对打造“无障碍博物馆”提出明确要求。

推动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需实现全方面、多层次的无障碍,建立整体性思维和全局性观念,将相关概念理论与博物馆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去认识博物馆的职责与工作、倾听公众的期待与心声。通过多维度无障碍打造无障博物馆,扫清观众在博物馆体验全过程中的障碍,提供能够让观众满意的优质服务,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并走进博物馆。推动博物馆的无障碍建设,需要实现博物馆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同步发展。在博物馆的外部,加强社会无障碍建设,为博物馆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无障碍环境;在博物馆内部,努力实现物理无障碍、认知无障碍和心理无障碍,从情境到细节让无障碍观念真正融入博物馆工作的全过程、全环节。

物理无障碍

物理无障碍是博物馆无障碍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实现时间无障碍、空间无障碍和设施无障碍,是公众迈入博物馆大门,成为博物馆观众的第一步。

面对公众对于博物馆可参观时间日趋多样化的期待,部分博物馆进行了夜场开放与24小时博物馆的创新性尝试,部分城市也开始实施博物馆交错闭馆日,展现了博物馆开放运营时间的多种可能性。博物馆应明确规定观众及潜在观众的参观习惯与时间需求,考虑运营现状及工作人员实际情况,科学、有针对性地灵活设置开放时间,破除博物馆开放时间段的固定化、单一化。

博物馆全国分布的差异化、城市分布的郊区化,使得公众去博物馆参观存在距离和交通上一定的不便。博物馆应通过优化交通线路、完善停车场配套设施等方式,便捷公众前往博物馆的道路。另一方面,拓宽博物馆“走近”公众的路径,开展进社区、进养老院、进特殊教育学校等活动,探索图书馆、商场、地铁等展示空间,将文物知识、展陈服务、讲解教育与互动体验带到公众身边。与此同时,线上博物馆的持续建设,对于突破博物馆时空障碍也具有重要意义,网页客户端、小程序可以帮助观众

实现随时随地“参观”博物馆。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文物保护体系从传统“藏宝”向现代“护宝”转型的关键阶段,尽管时局动荡,却在文物价值认知、分级管理实践与制度构建上留下深刻印记。这一时期的文物定级虽未形成统一的“一级、二级、三级”明确称谓,却通过立法探索、多元实践逐步构建起“价值优先、分类保护”的制度。

立法探索:从“分类管理”到“价值分级”的制度雏形

民国建立初期,文物保护面临“权属模糊、流失严重”的困境,1914年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限制古物出口令》,首次以国家名义强调文物特殊性,但未涉及价值分级标准。直至1930年《古物保存法》颁布,才从法律层面构建文物价值评估基础——将古物定义为“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切实物”,并隐含“特殊价值”与“一般价值”的分级逻辑,如规定“具有特殊价值之古物”出口、转让需经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普通文物则由地方管理。

1935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进一步细化古物认定三大标准——“时间久远、数量寡少、具有科学、历史或艺术价值”,这一标准成为后续文物分级的核心依据。不过,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始终未出台专门的《古物分级办法》,立法仅停留在“价值判断框架”层面,未明确“如何划分等级”“不同等级对应何种保护措施”,这种制度空白,为后期实践中的临时分级埋下伏笔。

实践操作:文物流转中的分级逻辑

民国时期的文物定级工作在故宫文物南迁、国际展览、地方保护等实践中得以体现,初步形成一套“筛选—保护—展示”分级链条。

故宫文物南迁:应急筛选中的价值排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启动文物南迁,这是民国首次大规模文物价值定级实践。马衡、欧阳道达等学者组成鉴定委员会,依据“历史价值优先,艺术价值为辅”原则,将文物分为“优先迁移”“暂缓迁移”两类:宋元书画、商周青铜礼器(如《清明上河图》《毛公鼎》)等孤品或重大历史意义文物列为“优先迁移”;明清易损瓷器、普通文献则暂缓迁移。1939年文物西迁乐山安谷时,分级保护进

实现随时随地“参观”博物馆。

设施无障碍,也可以理解为硬性无障碍,应能够满足观众在博物馆参观、活动过程中的基本需要,并致力于打造更加轻松、便捷、愉悦的参观体验。主动完善基础性的无障碍通道、母婴室、饮水机,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无障碍洗手间、服务犬洗手间、盲文指示牌、可供租用的轮椅及婴儿车等满足公众活动基本需求的基础设施。同时,要避免设施高度机械化、智能化过程中的无障碍“陷阱”,加强对于观众使用新设备、新技术的引导与帮助,保障老人儿童、外籍来华人员等各群体使用预约系统、数字设备的便捷性。此外,提供充足、舒适的休憩场所,将有助于缓解观众在身体、思想和心理上的博物馆疲劳。

物理无障碍是公众与博物馆交流的第一阶段,是最具直观性的呈现与互动。物理无障碍中的时空无障碍发展,将不断降低观众在走进博物馆过程中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经济成本;设施无障碍发展,则帮助公众更好地接受、享受博物馆独特的文化体验和精神愉悦。

认知无障碍

认知无障碍是决定观众博物馆体验是否有所收获的重要层级。观众在走进博物馆收获感受与体验的全过程中不断地“输入”各类信息,专业知识壁垒、学习方式差异等可能导致观众无法准确的理解,形成认知障碍,从而影响观众的最终体验。发展多系统、多层次的认知无障碍,以实现观众对博物馆语言、文字、思想的识读、学习、理解与记忆。

多系统的认知无障碍,需要发展博物馆中陈列系统、导览系统、讲解系统、社教系统、服务系统、文创系统以及网络系统的可及性,在各个系统的语言、文字、文化因素设计中融入无障碍思想,努力实现不同系统的特色突出与相互配合。如通过讲解系统的多语言讲解,补充展陈系统中文字语言类型的不足;通过社教系统和网络系统的拓展,延伸展陈系统中展示内容和展示空间的认知与体验。

多层次的认知无障碍,主要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公众。面对认知水平、接收能力、兴趣爱好、关注重点、参观目的等存在差异的博物馆观众,博物馆应通过工作人员技能培养、工作设施技术升级等方式实现多样化认知服务,探索手语讲解、盲文展览、触摸模型、拼音标注、知识拓展电子屏等认知服务模式。

认知无障碍是公众与博物馆交流的第二阶段,公众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博物馆所传达的内容与思想,真正同博物馆、博物馆中的物、博物馆中的人展开交流与对话。

心理无障碍

心理无障碍是无障碍博物馆发展的关键和根基。要明确博物馆无障碍是面向全部公众的可及性,不是针对少数群体的特殊化,是为了带给全部

公众群体更易触及、更易深入的博物馆体验的努力。无障碍博物馆不存在例外与排斥。

博物馆心理无障碍要从博物馆工作环节和工作细节两个方向发力,改变社会与博物馆内可能存在的狭隘观念与不平等思想,冲破影响博物馆无障碍的心理屏障。首先,要注重加强对博物馆各领域工作人员的无障碍职业培训,帮助其真正了解博物馆面对的各类公众群体(包括视听障碍者、读写障碍者、孤独症谱系障碍者、老人儿童等)及其特性,消除和打破心理上可能存在的错误认知与隐性偏见,实现全工作环节尊重理解、平等对待每一位博物馆观众。其次,对于博物馆工作细节的关注。博物馆要注意导览语言、陈列语言、讲解语言等的运用,关注语言使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严谨性,消除其中可能潜在的偏见与压迫。优化环境设计、需求关注等工作细节,从点滴中消除公众参观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不适应”。

心理无障碍是公众与博物馆交流的第三阶段,通过心理无障碍的方式让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知识传递、思想传播与情感交流更加顺畅,让所有公众都能够能够在博物馆中收获最大程度的尊重与归属。

社会无障碍

探索无障碍博物馆的建设问题,不仅要从博物馆内建设发力,同时也要关注博物馆外部环境。当前阻碍公众博物馆体验的一个外部原因是:部分公众无法走入博物馆。例如,部分儿童、老年人、视听障碍者很难顺畅地独自走入博物馆。而关注他人外表与身体这一“社会凝视”现象的存在,也使部分公众群体不愿前往人员密集的公共空间。

作为无障碍博物馆的重要外延,社会无障碍的发展要积极向社会传递包容、可及、平等的理念,推动社会包容与社会公平。博物馆可以通过官网、公众媒体等线上平台,场馆、地铁、公交广告栏等线下平台,推出相关内容帮助公众理解并传播无障碍观念。例如,除使用传统多彩海报宣传外,尝试色弱彩校正海报、手语宣传片、含字幕宣传片等,直观地向社会展现平等、多元、开放的思想,拉近人与人、人与博物馆之间的距离。发展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招募的多元性,发现退休人群、手语使用者等不同群体在博物馆工作中的独特优势与重要价值。

通过无障碍博物馆辐射社会发展,营造平等、公平、和谐的整体社会环境,进而消除歧视、凝视与偏见对博物馆与社会的负面影响。

为公众服务是博物馆的宗旨。在博物馆热潮不断涌现的今天,我国博物馆的高质量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公众参与的数量,还要重视公众服务的广泛性与深层化。探索从物理无障碍、认知无障碍、心理无障碍和社会无障碍四个维度实现博物馆无障碍建设,是更好实现博物馆为美好生活赋能、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推动博物馆融入社会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路径。未来,我国无障碍博物馆将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切中博物馆事业发展脉搏,努力实现博物馆面向人人、拥抱人人。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馆藏文物定级

民国时期馆藏文物定级制度演变略述

陈宇

一步细化。工作人员遵循“价值决定保护优先级”的逻辑,按材质与价值分类存放文物:书画类专设恒温库房,青铜重器置于底层防潮区域,普通瓷器采用木架分层堆放,切实守护了战乱中的文化瑰宝。

国际展览:“国宝级”标准的公开呈现

1935年至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9年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会”,成为民国文物定级标准的公开展示窗口。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全国筛选展品,制定“年代宋代以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代表中国文化特质”的“国宝级”入选标准,最终选出的735件展品中,故宫文物占520件,均为经学者鉴定的“优先保护”级文物。如《女史箴图》、汝窑洗等因“兼具历史与艺术双重最高价值”入选,同类普通文物则因“数量较多、代表性不足”落选,这种筛选逻辑,实质是将内部定级标准转化为公开准则。

地方保护:区域特色的分级探索

地方层面的定级实践同样活跃。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周代青铜器后,学者通过形制考证、铭文解读,将其分为“重器”“一般器物”两类:带重要铭文的青铜礼器列为“优先保护”,交由河南省博物馆收藏;普通日用青铜器登记造册,由地方妥善保管。1945年,由杨家骆发起组织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调查川渝地区的石窟寺。考察结束后,杨家骆起草了一份“关于保存石刻的详细计划”,按照艺术价值、保存状况分级——对宋代千手观音等“造型精美、保存完整”造像制定专项保护方案,残损造像则记录存档待修复,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分级策略。

运台文物:民国时期的临时分级操作

1948年国民党筹备文物运台,由特殊背景催生了民国时期最精细的文物分级体系。而宋伯胤在日记中的亲历记录,完整还原了这一过程的细节,也凸显出“长期无制度、临时突击分级”的历史反差。

临时分级标识。为筛选运台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家团队设计了一套“价值+材质”的分级体系:铜器分为“A铜、B铜、C铜”,瓷器分为“A瓷、B瓷、C瓷”,书画、珐琅等品类参照执行。其中,A铜特指商周带铭文青铜重器,“A瓷”为各朝代表性瓷器,宋版书、明太祖御笔直接归入“优先保护”类,这种“三级细分”的精细度,是民国以来首次出现,且完全服务于“筛选精品运台”的临时分级操作。

临时操作流程。分级工作严格遵循“专家鉴定—签字确认—分类造册”流程。宋伯胤作为记录人

员,需“按专家意见逐件登记等级”,并请学者在记录上签字,确保结果可追溯。1948年10月集中开箱清点时,他在日记中记载,“10月4日开30箱,10月5日开54箱(短少5件炉均釉瓷器),10月7日开80箱”,高强度开箱本质是为“逐件评估等级”提供基础;鉴定后,团队按等级编制《A铜清册》《B瓷清册》,明确文物数量、特征与运输优先级,形成操作闭环。

临时保护策略。分级结果直接与运输保护措施挂钩。据宋伯胤记录,A类文物